

声调对比法与北京话双音组的重音类型^{*}

王志洁¹ 冯胜利^{2,3}

¹美国海军学院外语系 马里兰州安那波利斯市

²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化系 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

³北京语言大学 北京 100083

提要 北京话词重音的有无及其分布的规律是汉语音系中长期以来争议最多、挑战性最强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双音组这一重音的最小单位入手,一方面探讨重音的表现及其与声调的关系,一方面探讨重音的辨别方法及其类型的界定。我们认为:声调语言的轻重音必然表现为调值实现的充分度,而这种充分度既可以通过语音设备来测量,又可以通过对比法用说活人的内在语感来鉴别,二者均不失为当代音系研究的手段。本文提供了作者自1996年以来共同探讨用对比方法测试北京人对北京话带调双音节词语重音的内在语感所得到的初步认识,并对今后的词重音研究提出一些设想和建议。

关键词 重音 声调 轻声词 带调双音组 带调左重组 最小差别对

中图分类号 H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 - 9484(2006)01 - 0003 - 20

1 引言

北京话的词重音研究虽由来已久,但至今似乎收效甚微。许多核心问题长期缺乏明显的共识,且各家在研究方向、基本理论及其方法上不善交流、缺乏讨论,更鲜互相引证,使得这一汉语音系上的重大问题始终处于若明若暗的状态。就重音的有无来讲,虽像高名凯、石安石(1963)那样的“汉语无重音说”已不再有人提起,但很多人仍仅停留在承认有轻声词的程度,将带调音节一律看成重读音节。时至二十一世纪,就连一些在汉语音系学上的知名学者都不得不承认重音研究的困难。(参见Chen 2001)究其因,恐怕一方面因为汉语是声调语言,区分词汇意义的主要音系手段是声调而不是重音,于是重音成了较为次要的音系特征;另一方面,由于声调的交织与覆盖,使重音的表现难以捕捉,尤其是除掉轻声以外的轻重区别。就像赵元任先生早年指出的那样,(Chao 1968)北京人对轻声以外音节轻重的判断很难达到一致。Chen(2001:288)更用“notoriously elusive”的字眼(可译为“众所周知地难以断定”)来形容这种情况。本文的研究正是以探讨如何解决这一困难为出发点,力求在众多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可行的方法来捕捉北京人对带调音节轻重的语感。我们从可以显示轻重音对比的最小单位双音组入

[收稿日期] 2004年11月20日 [定稿日期] 2005年9月10日

*本研究曾得到香港城市大学1996、1999年战略研究经费、美国海军学院2002年校内科研经费以及堪萨斯大学科研经费的资助,特此鸣谢。相关研究成果曾先后在1998年北京现代汉语语法学国际研讨会、1998年香港语言学学会年会、2000年圣地亚哥第12届北美汉语语言学年会及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日常科研讨论会上多次报告,得到听众及界内同事多方评论支持,并蒙本刊匿名专家提出细致中肯的修改意见,在此一道致谢。

手,选择了大量的语料反复检验推敲,对每个词语的判断在几个、十几个不同的北京人中间交叉核实,最终筛选出了几百对轻重表现不同的“最小差别对”(或“近似最小差别对”)。在这个反复调查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重音的表现绝不像有些学者所断言的那样与声调无关。(见 Duanmu 2000)^[1]恰恰相反,重音必须通过声调在轻重音节里的不同体现,通过声调的对比才能辨别出来。我们的研究一方面支持了厉为民(1981)、殷作炎(1982)、徐世荣(1982)等学者将北京话词重音分为重、中、轻三等的说法,再次证明了左重的双音组除了“重轻”型的轻声词以外另有“重中”之说;另一方面又发现了重中词同轻声词之间的联系,以及带调的右重组与左重组(即所谓“中重”与“重中”)之间的不对称现象,^[2]进而建立起了将北京话双音组基本上只分为“右重”和“左重”两大主要类型的新设想。这一结果的获得源于突破了以“带调”和“不带调”为主要区分的传统做法,把“重中”和“重轻”归作了一大类,更从音系的角度看到了所谓的“中重”词语同“重重”并无实质性区别,因而可以不作区分。

在这篇文章里,首先简要评述以往有代表性的研究,然后介绍我们自己从反复不断的摸索中总结出的“声调对比法”,解释如何运用这一方法的道理,讨论与之相关的问题。尤其要讨论文料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在研究中将考察的目标严格控制在北京话的口语语体上,以避免书面语体中重音的不同表现对调查结果的干扰。最后,将扼要报告通过声调对比法所测到的北京话双音组的重音类型,以及如何进一步确认和研究这一分类模式的理论构想。

2 文献综述

前面提到,词重音的研究必须从轻重对比的最小单位双音节词语入手。对此,大部分学者皆有共识,且对北京话里有轻声词的结论也均无异议,只是在除掉轻声词以外的那部分“带调”双音组中,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分析。有的通过逐个审词将重音类型作出较细的区分,有的试图通过语音实验寻找倾向性的结论,也有的从语法和音系的角度做出论断。在下面三个小节里,我们选择近二十多年里各类研究中有代表性的作些评述。

2.1 审词定类

将带调双音组用审词的方法分类描写的作者包括厉为民(1981)、殷作炎(1982)、徐世荣(1982)等。这些研究的特点是作者从本身的初步观察出发,将所选定语料中的全部双音组逐个审核,根据自己对北京话的语感做出判断,从而归类。比如厉为民(1981)就用了《现代汉语词典》和一本1966年由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的、加注拼音的《小学语文朗读文选》,殷作炎(1982)用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9年编印的《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而徐世荣(1982)则审查了从各类语料里选出的两万个常用的双音节词。他们通过这样的审词,得到了几条相当一致的结果。一是发现轻声词在整个双音节词语里所占的比例极少。厉对《现汉》和《文选》的统计分别为6.65%和14%。^[3]殷对《词表》的统计也是14%。徐在

[1] Duanmu (2000:144) 的原文是:“I have argued that SC(Standard Chinese) has stress, which is easy to feel between a full syllable (stressed) and a weak syllable (unstressed). In addition, stress is hard to feel among full syllables because SC is a tone language, in which tone cannot be used to indicate main stress.”其中的第二句话可译为:“此外,汉语重读音节的重音难以感觉到,这是因为汉语是声调语言。在这样一个声调语言中,声调不可以被用来表示主要重音。”

[2] “带调”亦称“全调”,是针对轻声词的“失调”而言。轻声词的第二个音节因轻声而不再读本调,却将本来有鲜明对比的四声“中和”成一种同四个声调都不相同的弱调,在一、二、四声后调值偏低,在三声后偏高,有人将其称为“第五调”,也有人称之为“中和调(neutral tone)”。

[3] 根据文献发表时间,所用的《现代汉语词典》应是商务印书馆1979年的旧版,不包括新版对轻声标注的修订。

20000 个常用双音词中共选出了 1500 个轻声词,比例是 7.5%。二是轻声词的不稳定性。三位作者分别举出大量例词来说明各个语料来源所标轻声的不一致性,如厉为民(1981:35)所列的下列三组:《文选》标轻声而《现汉》标非轻声,如帮助、医生、犹豫、天气、解释、(好)容易、组织、太阳、跳蚤、臭虫等;《现汉》标轻声而《文选》标非轻声,如还是、道理、想法、看法、任务、教训、动静、态度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读轻声而《现汉》标非轻声,如克服、计划、项目、纪律、适应、建设、严重、组织、要求、迫切等。

三是关于双音词重音的等级和分类。三位作者都意识到:不带词缀也不属于叠字的那部分轻声词,如朋友、豆腐等,其前身为带调的“前重”或“左重”词,厉为民说它们之间是“流与源的关系”。为了准确描写那一部分既区别于“后重”或“右重”又区别于轻声词的双音组,殷作炎(1982:168)提出:建立一个“中”等是“有必要的。”他将 2100 个双音词分为“中重”(67%+)、“重中”(17%+)和“重轻”(14%+)三等。徐世荣又在此基础上提出增加一个“次轻”级,以表示“重中”的“中”轻于“中重”的“中”,尤其是当后音节是三声的时候。〔4〕

我们认为这三位作者的研究成果很值得借鉴。其他持这种三等或四等重音观点的学者包括窦道明(Dow 1971,1972)、郑锦全(Cheng 1973)、Hoa(1983)和 Kratochvil(1964,1969,1974,巴维尔 1987),其中尤数 Kratochvil 的一系列研究值得注意,我们将在下一节专门介绍。

2.2 语音实验

英国语音学家 Kratochvil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做了一系列关于北京话轻重音及声调的研究,这里重点评述由许毅译成中文的一篇(巴维尔 1987)。作者在文中报告了对一个中年的北京女发音人一段日常谈话片断所作的语音分析。这段谈话包括 1390 个音节,实验测量的重点是音节的轻重。由于作者认为基频(F_0)、振幅(A)和时长(T)这三种音值交替形成的强弱离差(prominence deviation)较能反映音节的强弱,他在实验中便采用由这三个值的乘积得出的音量(V)来分析。其结果发现,正常北京话里的强弱模式是非常易变的,轻声词的界限“也许不像普遍相信得那么严格(1987:339)。”他把测得的双音组的重音类型分为五种,排成一个从右重到左重的序列,如下所示(例词后之注解系作者原话):

- 1) 你看:抑扬格,松散的句法结构;
- 2) 服输:抑扬格,更紧凑一点的结构;
- 3) 就是:抑扬格或扬抑格,以句法功能形式化而不是以紧凑为特点的结构;
- 4) 爱情:扬抑格,但第二个成份是有声调的,紧密的构型结构;
- 5) 车子:扬抑格,第二个成份是轻声,完全形式化的结构。

这里且不管作者在结构上的描写,仅就他对重音类型的区分来看,在双音组的重音分为抑扬格和带调与轻声两种扬抑格这点上,Kratochvil 的结论同前述审词的研究大体一致。然而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其他语音实验研究的验证和支持,下面三个另外的语音实验就反映了不同的结果。

首先是由林茂灿、颜景助、孙国华(1984)所作的实验。研究者选了 103 个涵盖 16 种声调组合及主谓、动宾等 5 种主要语法结构的双音组,请发音人照卡片所写的两个汉字逐个发音,之后由 8 个听音人听辨。实验结果表明,大多数的双音组为后重。林茂灿(1989:240)在重述这一听辨实验时报告说,两个发音人后重的比例分别为 91.2% 和 88.3%，“没有一个两字组一定要读前重”。

或许是看到了林等(1984)这一实验在设计上的缺点,即仅仅选用孤立的双音组作为材料,因而无法

〔4〕徐在文章中强调“重中”里后字的三声与“重轻”里后字的三声调值不同,我们认为前者恰是音节尚未失调的表现。有关论述可参见王志洁(1999a)和 Wang(2000),下文对此也将详加讨论。

避免后字在停顿前的拖长,王晶、王理嘉等(1993:113)将所测词放在了统一的负载句中,负载句是“书上没有□□这个词(这个人)。”实验总共测了83个双音词、65个三音词、68个四音词和270个单音词,主要检验音节的时长。其得到的结果同上述林等的结果截然相反,即“双音词前字长于后字”,男女两个发音人前后音节相对系数平均值比例为0.81:0.66和0.77:0.68。

第三个语音实验是毛世桢(1999:115)对117个“重中”格词的考察。他用上海市普通话测试中心提供的材料,将这些词放在22个句子的句首、句中、句末等不同位置上,请两位北京人录音;之后计算这些词前后音节的时长比值,得到的结果是:117个被列为“重中”的词中有64%同“重轻”格相同,32%与“中重”格一致,因而“在词汇平面上(词处在备用状态下)双音词只有前重与后重两种格式。所谓重中实际是犹疑于这两种格式之间的词,……有时发成前重,有时发成后重。”

2.3 音系推断

这一小节我们主要介绍Lin(1994,2001)和端木三(Duanmu 2000,2001;端木三2000)两位学者从音系理论角度对词重音的研究。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林华注明了她研究的目标语言是北方官话,尤其是北京话(Northern Mandarin, Lin 1994:110),而端木的研究对象是普通话,或为国语(Standard Chinese, Duanmu 2000:5)。^[5]

Lin主要反对以赵元任先生为代表的所谓“后重”的传统观点,即“当双音节词语的第二个音节不是轻声的时候其后音节稍重,”(Chao 1968:29)以及“当几个持有一般重音的音节连在一起的时候其语音上的轻重程度并不相同:末尾的音节最重,开头的次之,中间的最轻。”(同上:29)Lin用四条理由来证明双音组的重音应为前重后轻,(Lin 1994:102)并提出两条音系规则来概括她的推断:一条叫“域首重音规则(Domain-Initial Stress Rule)”,规定将重音加在每个最小音系领域最左边的音节上。另一条叫“声调中和规则(Tone Neutralization Rule)”,规定将紧跟在域首重音节之后那个音节的声调变成中和调,即轻声。然而第二条规则的应用是选择性的,具体哪些词会变成轻声则由五个其他因素决定,即:正式语体或口语,说话者个人因素,音节原有声调,轻声词辩义功能,及方言差异。(Lin 2001:156)^[6]

端木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词重音的论述集中总结在他的《普通话音系》(The Phonology of Standard Chinese)一书第六章第四节里。(Duanmu 2000:136-142)他提出了两个论点,一是每个普通词里的音节从左向右形成重轻重轻的系列,其中第一个重轻的组合最重;二是合成词和短语的重音均由“辅重”规则(Nonhead Stress)决定,即所有句法上的非中心词都得到重音,如名词短语里的状定成分、动介短语里的宾语等。(详见端木书中6.2.5节及Duanmu 1990)他以两条理论交互使用为依据,分析了双音节、三音节和四音节的例字,结果如例(1)——(3)所示(其中方括号标示词语的句法结构,数字是音节数,S=重,W=轻,M=中):

- | | | |
|------------------|-----------|----------------------|
| (1) 双音节:高山[11] | S - W | |
| (2) 三音节:芝加哥[111] | S - W - M | 或 S - W - W |
| 峨眉山[21] | S - W - M | 或 S - W - W |
| 老司机[12] | S - W - W | 或 S - W - M (在末尾位置时) |

[5] 我们认为:研究重音必须限定方言,普通话不就是北京方言,因此本文一以北京人的北京话为准。

[6] Lin(1994:102)给“最小音系领域”下的定义是“音系过程可以发生的最小的领域”。原文是“a smallest domain over which a phonological process occurs”。

- (3) 四音节:大西红柿[13] S - W - W - M 或 S - W - W - W(在末尾位置时)
万丈光芒[22] S - W - M - W

Duanmu 认为他在上述分析中得到的音步同石基琳(Shih 1986, 1997)和陈渊泉(Chen 1996)分析三声变调时构成的音步大体一致,且其“轻”的位置也是轻声变为中和调的位置。至于其分析结果之所以不容易被感觉到的原因,端木认为是因为普通话是一个声调语言。在这个语言中,作为重音最重要语音表现的基频曲线(F_0 contour)被用来表达词汇的声调,因而不再能随重音而任意变换。^[7]换句话说,北京人的内在音系只能判断声调而不能感知重音。

2.4 几点评论

对于上述各家从词汇、语音、音系等三种不同角度来分析北京话(或以北京话为语音基础的普通话)词重音的结果,我们有以下几点总括的评论,也可以说是提出几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第一,关于词重音的性质。我们觉得有必要考虑词重音到底是一个语法问题(这里的语法不只包括句法,也包括音系)还是一个词汇问题。换句话说,它是可以由规则来概括和预测的现象呢,还是比较不规则的、靠说话人记忆中储存的信息来决定的现象呢?这是所有研究重音的人都要回答的问题。即使没有专门考虑或没有明确的回答,其研究也必然会反映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或出发点。比如前面第一节里综述的几位作者,显然是把重音当作词汇现象来研究。尽管他们在各自的文章中均尽量寻求重音同词汇内部结构和语义之间的关系,但他们的总体研究是建立在对每个词条逐一考察的基础之上,而且对语料的覆盖面相当大,又用统计数字来说明重音的类型。第三节里谈到的研究则不然,那两位作者都试图将重音看成可以用规则来概括说明的系统现象,因而都在建立规则上下功夫。林华在提出“首重”论的同时虽然指出了五种干扰这一理论的因素,并用了词汇扩散理论来解释词重音的历史变化,但却没有说明在实际使用的词汇中,起码在北京话的双音组中,到底有多大比例的词目没有受到干扰而系统地表现为首重,从而验证其理论的普遍性。端木三提出的两条理论一为“左重”的音系规则,一为“辅重”的句法规则,似乎将重音完全看作一种有规律的语言现象。如果这一主张连同其两条理论所预知的所有词重音都能得到所有语料和说话人语感的证实,那么北京话(或普通话)的词重音就无需再继续争论和探讨,问题就会一下子变得非常简单。

第二,关于语料在研究中的地位。我们认为,无论研究者从什么角度出发,选择什么途径和方法,都必须尊重语料,既要充分照顾到覆盖面,又要让所用的语料有代表性。上面第二节里引述的几个语音实验,除 Kratochvil 用了包含一千多个音节的话语以外,其余三个实验都只考察了一百个左右的双音组,占《现汉》中总数约为三万的双音词的三百分之一,(参见厉为民 1981)且读者并未看到全部实验材料。第三节里引述的理论研究使用的语料就更为有限,而且作者并未注明其重音的判断是否经过了任何当地人的核实。比如上文中所引的端木三的语料,双音组的例字只有高山一词,读者既难以得知是否作者实际观察到了说话人发音时的确将此词发成前重后轻,又难以得知是否就此所有普通话的双音词(哪怕是所有的偏正式双音词)都是重轻式。不知作者是否将其理论上的发现返回到更多的语料中去核实过。

我们认为,在语音和音系研究中使用的语料要满足三个基本要求。一是要取于自然语言而不是规

[7] 这里 Duanmu (2000:144) 的原文是:“...due to the fact that SC is a tone language, in which the most important phonetic cue for stress, F_0 contour, is taken up for lexical contrast and so cannot be freely altered to indicate stress.” 请参见同页中出现在下文里的另一句意思相同的论断,其英文原文已引在前面的脚注[1]里。

范语言。比如北京话是自然语言,而普通话或国语是规范语言。尽管它以北京话为语音基础,但它只能是近似于北京话的一个各种发音的集合体。从讲普通话的各方言区的人嘴里得到的发音和判断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尤其是像重音这种微妙的成份。其次是语料必须以口语语体为准。这在重音的研究中尤为重要,因为北京人嘴上的重音形式,往往有“文白”两读,^[8]文读(正式语体)与白读(口语语体)并不一样。不明于此,则是非两淆,轻重莫辨。以往谈重音者未能深加分辨,故而你轻我重,莫衷一是。三是研究者要尽量客观,尽量做到观察上的贴切和描写上的准确。如果一个研究成果所依据的语料被大多数当地人判断为“我们不这么说”,那这份成果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和说服力。

第三,关于研究的方法。我们认为不仅应该鼓励各种方法兼容并蓄,而且尤应倡导不同类型研究之间的相互吸收和启发。我们既不赞成不参考实验数据和语料而凭空进行理论推断,也反对只相信仪器测出的数据,而把依赖说话人语感所作的判断一律斥之为非科学的“口耳之说”。语音实验如果没有整体音系理论的指导和对音系结构的理解,得到的数据可以因设计中的种种缺陷而丧失其应有的价值。反之,音系论证如果不是严格地建立在对语料的审慎观察和恰当描写的基础之上,如果不能尽量准确和客观地反映一个自然语言里大多数说话人的内在语感,如果不是首先建立设想而后用大量语料反复地审真辨伪,那就难免主观片面,甚至有“非科学”之嫌。

第四,关于研究的范围与层面。我们认为,上述所有研究对此均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也未给以充分的说明;只有 Kratochvil 稍稍提到重音的分析,有可能也包含像赵元任先生(Chao 1968)所讲的关于语调中那种“大波浪”和“小波纹”的关系。这一观点同我们自己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探讨词重音所得到的理解正相吻合。我们初步认为:词重音和句中显示的语流节奏重音需要作为两个层面上“既相关又有别”的两种音系现象来研究。词重音更多地属于词汇的范围,研究的重点应当集中在那些并非可以由句法或音系规则直接推导出的表层分布,这很可能就是林华所提出的那些同社会语言学相关的因素与音系规律交叉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历时的词汇变化同共时的语言变异互动的产物。(参 Feng 1995)而当我们对词重音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之后,当然就可以进而考察语流节奏重音的“大波浪”到底遵循什么性质的音系规律,从而可以减少有意无意地将二者混为一谈的盲目性。^[9]

第五,关于重音的表现。以上各家都谈到了语音学上常用音节的时长作为重音的体现,也有的用到基频和振幅,更有的如 Kratochvil 用到了由这三个值的乘积得出的音量,但这些大半是声学语音学上的征兆。在听辨和审词的实验中,恐怕只有音节长度比较容易感知,所以王晶、王理嘉等及毛世桢的实验都仅以考察时长为重点。但作为一种更全面的考虑,我们发现,以往研究对于另外一个与重音密切相关的变量——声调,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哪一家详尽地探讨过。尽管林茂灿(1989:245)曾简单列举过如 Abramson(1979)等人的有关看法,谈到泰语的重音除了表现为音节时长的加大,还表现为“声调拱度接近于理想形式……”,徐世荣(1980)认为重音使“声调特别分明,或者高些”,Yip(1982)也认同“汉语重音与声调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与此相反的是端木三对声调的否认态度,认为在一个声调语言中,声调根本不可以用来表示重音。我们认为这种全然否定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如果在声调语言中声调不能用来表示重音,重音又没有用其他方式来表现的可能,那么,说北京话的人对于重音的语感又如何解释呢?这岂不是说北京人说的话里根本就没有重音,因而说话人也就没有支配轻重的语言能力了吗?倘果真如此,当代音系学在这方面的研究岂不成了无的放矢,而重音理论的真伪又将如何

[8] 这里的文白系指北京方言中共时的正式语体与口语语体之间的(重音)差异。

[9] 本段中的观点系两位作者从多年研究中逐渐总结出的重要观点。限于篇幅,与此相关的具体讨论只得割爱。

判断呢?

我们觉得,声调在以往研究中之所以没有被列为重音的一个表现,是因为它的变化多端及难以捉摸。这里且不谈它在声学上的表征如何不易捕获,起码在直接听辨时,大家往往会认为,声调的所谓“理想形式”或“特别分明”的程度并非那么容易鉴别。我们通过对词重音的反复研究得到了一些体会,这也就是本文即将重点介绍的所谓“声调对比法”。我们相信,只要对问题的性质能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对语料能有较为细致的观察和分辨,就能对声调和重音交织形成的复杂现象给以恰当的描述和讨论。

3 声调对比法

这一节介绍我们如何认识到声调在表达音节(特别是带调音节)轻重差别时所起的作用,以及如何运用声调对比所得到的差别来确定带调双音组的重音类型。研究的重点是寻找“重中”(即左重)词,因为这是带调双音组中争议最大的类别。当然我们也同时考察其他的重音类型,譬如,除了“重中”以外,是否都是“中重”(即右重)?有没有可能还有一个(也许还是更大的一个)“重重”(即左右不分)的类型?我们的方法基本上也是厉为民、殷作炎、徐世荣等所用的那种“审词法”,语料是从《现汉》的大约六万个双音节词语中,参照几个其他常用字词的语料库所选出的两万条常用条目。^[10]我们两位研究者分别将两万条词条用自省加咨询的方法^[11]确定为三类:左重、右重和“不分”(或称“同重”),取二人相同的判断进行统计。第一轮判断的结果大约有一万条一致,其中三个重音类型大体各占三分之一。^[12]第二轮的审词将在重新修订后的语料库中进行,这里只讨论我们审词过程中逐步建立起的认识和方法。

3.1 最小差别对

由于我们在建立语料库时将声调作为一个重要的相关因素,^[13]因而每个条目都以北京话四个词本调的数字标注了调型,如11(鲜花),24(煤气),32(旅游)等等。因为不包括轻声,所以一共有16个调型的搭配。下面讨论的声调对比都是按照这些调型来检验的。

我们审词时发现,的确如徐世荣等曾经指出的那样,中重里的“中”和重中里的“中”其实轻重程度很不一样:前者更接近于“重”而后者较接近于“轻”。换句话说,就每个双音组的前音节而言,中重和同重的区别相当不明显,所以在比较的时候,我们把焦点聚集在每个双音组的第二个音节上。只要能发现这个后音节既不同于中重型或同重型的“重”,又区别于重轻型的“轻”,那么这个区别就是有意义的,就说明有建立“中”这一等级的必要,也就可以随之证明北京话带调双音组存在前重与后重之分。

为了达到证实这一区分的目的,我们决定将二人一致判断为左重的双音组共同复审,并详细推敲已

[10] 我们开始建立语料库使用的是旧版《现汉》,后来又增加了《补编》里相应的内容。新版《现汉》出版后,又将整个语料库根据新版重新进行了核实。之所以总数达到将近六万,是因为我们不仅收了词典中按顺序列入的词条,而且收了所有例句中出现的双音节词语。

[11] 因为作者中冯为北京人,王为长期使用普通话并在北京生活过的天津人,所以后者较多地使用了咨询的手段,向不同的北京人进行调查后再决定分类。调查结果证明,王对大多数词条的重音判断同所调查的北京人是一致的。

[12] 我们对此结果并不满意,因为发现《现汉》的语料中包含太多的书面语、古语和方言词,而且所依照选词的其他语料库大都是以常用“字”为基础建立的,对我们选词的恰当性有一定影响,所以我们正在重新修订这一语料库,使其只含北京话口语里常用的双字组。

[13] 对双字组轻重音节声调差别的研究有一部份是源于对重音类型的解释,因为在我们参考的文献中包括像Meridith(1990)那种完全以声调决定重音的分析,以及蒋平(1996)有关声调强弱顺序如何影响重音的论述。我们自己的有关看法在Wang(1998)中有所交待,但本文并不讨论这方面的内容,而只集中在对表层重音的观察、审定和判断上。

发现的左重结果到底是不是稳定可靠。就是在这样一个反复审核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建立相同发音、相同声调而不同重音类型的“最小差别对”或“近似最小差别对”是最切实有效的方法。所谓“近似最小差别对”,是指两个词语的发音稍有不同,但十分相近,足以将重音孤立成唯一的差别。下面就将16个调型里初步判断为前重的例词每组选出三个,和它们相应的后重或同重的词语一起列出来,作为前后重音对比的最小差别对。为了对比的鲜明,后重的例子有许多是动宾短语而不是合成词,因为动宾结构是大家早就公认的后重类型。我们没有同时将前重词语和它们相应的轻声词对照列出,这是因为轻声词已在大部分字典上有所标注,且已得到公认,无需再通过对照而重新验证。^[14]但在比较声调的时候,我们用了“子、头、了、的”一类的轻声词缀。比如下面的左重例子[文]明,^[15]其带调的后音节的声调显然不同于轻声的[蚊]子,[新]交也不同于[新]的,等等。这种对比因为比较有规律,因为没有人会怀疑词缀的轻声性质,所以就不必一一列出了。

- | | | |
|----------------------|---------------|---------------------------------------|
| (4) 1-1:[初]期 / 初[七], | [新]交 / 心[焦], | [乡]亲 / 相[亲], |
| 1-2:[工]程 / 攻[城], | [声]学 / 升[学], | [商]人 / 伤[人], |
| 1-3:[公]有 / 工[友], | [梳]理 / 输[理], | [身]手 / 伸[手], |
| 1-4:[交]代 / 胶[带], | [刊]物 / 勘[误], | [声]势 / 生[事], |
| 2-1:[茴]香 / 回[乡], | [寒]酸 / 含[酸], | [头]胎 / 投[胎], |
| 2-2:[文]明 / 闻[名], | [凡]人 / 烦[人], | [投]合 / 投[河], |
| 2-3:[林]产 / 临[产], | [刑]法 / 行[法], | [荀]子 / 寻[死], |
| 2-4:[谋]士 / 谋[事], | [茶]叶 / 查[夜], | [言]路 / 沿[路], |
| 3-1:[厂]家 / 想[家], | [损]失 / 死[尸], | [瓦]工 / 打[工], |
| 3-2:[敢]于 / 赶[鱼], | [裹]胁 / 裹[鞋], | [举]人 _n / 举[人] _v |
| 3-3:[手]法 / 守[法], | [古]板 / 鼓[板], | [老]酒 / 老[九], |
| 3-4:[启]事 / 起[誓], | [筒]陋 / 捡[漏儿], | [韭]菜 / 酒[菜], |
| 4-1:[道]家 / 到[家], | [作]风 / 做[东], | [利]息 / 第[七], |
| 4-2:[便]捷 / 变[节], | [进]程 / 进[城], | [泛]读 / 贩[毒], |
| 4-3:[助]手 / 住[手], | [下]场 / 下[厂], | [话]语 / 画[雨], |
| 4-4:[避]讳 / 闭[会], | [阅]历 / 月[历], | [限]制 / 县[志], |

通过在每个最小差别对的左右重词语之间进行比较,我们发现音节的声调对重音不仅有着同时长一样明显的表现力,而且声调的差别甚至更为生动,更容易感知。这里所讲的声调差别主要是指每个调值在双音组的前后音节里实现的充分程度。比如一声本为高平调,调值是55,在重读音节上它表现得高而长,可是在轻音节里就不仅短,而且低。二声和四声分别为由中向高和由高向低的两个曲折调(英语文献中称 contour tones,见 Yip 1990, Bao 1999, Chen 2001),调值为35和51,可是在左重之后的轻音节里,它们都会因时间缩短而不能实现其中包括的曲折度:上升的升不到应有的高度,下降的也降不

[14] 例(4)里所列的左重词都以《现汉》的标音为据,但我们完全同意某些学者关于轻声词是一个不稳定的集合体的说法,也充分认识到轻声词的确定标准不易掌握,所以如果例(4)里所列的某些左重词语在北京当地读者看来应该是轻声,那只能说明《现汉》对轻声的标注没有充分反映北京人的语感。而如果《现汉》以所谓普通话的标准和以规范为原则,刻意将这些词语标为非轻声词,那就更加说明带调的双音组有相当数量应为左重。

[15] 注意:这里将“文明”判断为左重是指其口语语体的“白读”,如:“老兄,你能不能[文]明点儿?”如果是“文读”,如称“世界文明”,或者报道“市民的文明程度有所提高”,那么“文明”就不是左重了。下引诸例均仿此。

到位。与此相反,同样的曲折调在右重的重音节里就实现得极为充分,表现出清晰、明朗、容易感觉到的升降程度。三声的现象更为有趣。它在右重的重音节里不仅能充分实现其本身应有的先降后升的曲折,即 214 的调值,而且会根据三声变调的音系规则触发前面的三声音节变成二声,如例(4)中 3-3 调型的守[法]、鼓[板]、和老[九],同 2-3 调型的合[法]、铁[板]、和十[九]的声调就很相像。这与它们最小差别对里的左重词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为那里的三声后音节不但因时长被压缩而不得不丢失自己的升尾,变成众所周知的、通常出现在一、二、四声重音节之前的“半三声”,^[16]更要紧的是它同时也失掉了触发前面三声音节变调的能力。所以例(4)中的[手]法、[古]板、和[老]酒三个例词的前音节实际上还是标准的(甚至是夸大一点的)214 调值,而后音节“法”、“板”、“酒”的半三声则又短又低,连剩下的 21 调值都被挤得不像还有任何曲折度了。

为了将这些声调的对比体现得更为系统,我们选例(4)中每组的第一个最小差别对,重新排在表 1 里。表格左列数字为前音节声调,上方横排为后音节声调,每个纵列里左边是左重,右边是右重。这样就更可以看到每一个带调轻音节(以下划线标示)在同一纵列里的相同表现。

	1		2		3		4	
1	[初]期	初[七]	[工]程	攻[城]	[公]有	工[友]	[交]代	胶[带]
2	[茴]香	回[乡]	[文]明	闻[名]	[林]产	临[产]	[谋]士	谋[事]
3	[厂]家	想[家]	[敢]王	赶[鱼]	[手]法	守[法]	[启]事	起[誓]
4	[道]家	到[家]	[便]捷	变[节]	[助]手	住[手]	[避]讳	闭[会]

表 1

我们强调,在对所有这些语料的审核判断中,一定要严格遵循三个原则。第一个是“地道北京话”的原则,即所有判断必须以北京人的语感为准,母语是其他方言(特别是南方方言)的人,尽管多年讲普通话,若他们对重音的判断同北京人的不同,则不足为据。第二个是“地道口语”的原则,即所有语料必须取自非正式的(informal)口语语体,也就是“文白”语体中的“白”,而不是“文”的、或正式的(formal)“书面语体”。重音在这两种语体里的区别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为词语本身的用法,二为语境。词语本身的用法可由前面举过的“文明”一例看出。又如“圣明”,在口语语体里的“您[圣]明”和书面语体里的“天子圣明”中,重音形式也有天壤之别。在语境方面,我们发现,真正地“说”一句话和“读”一句话也会把一个词语的重音表现为不同的形式。譬如在考察的初期设计过类似这样的“地道口语”语句:“我就是要说我自己对,我没有你那么[谦]虚!”当不加任何限制、只请说话人把句子“读”出的时候,[谦]虚的左重音并不明显,而当我们使用这句话的语境限制为两人谈话时发生争吵,某甲试图劝说某乙稍加收敛、不要盛气凌人,而某乙执意不听、固执己见之时,说话人不再看到纸上写的句子,而是看到一个想象中的争执对象,这时他(或她)再来以自然对话的“架式(此处为强硬争吵)”来“说”那句话时,[谦]虚这个词就被说成明显的左重了。这样的实践使我们意识到:绝不能认为凡是口头得到的语料都是口语。“地道口语”的语句一旦失掉了真实的语境,就又会会在说话人的嘴里被转化成“口头的书面语体”。所以我们要指出:语体的差异在重音考察中实为关键,若不严格控制就很难得到真实的语料,甚至被误导。以往对这一原

[16] 这种调型在传统的分析中被确定为“三声之后的另一种轻声”,通常以小姐、想法等词为例,以同三声之后的“标准轻声”如奶奶、耳朵等加以区别。王志洁在陈中瑜(Chen 1984)论述的启发之下,在(1996)和(1999a)的两篇论文中对此提出异议,指出既然轻声的调值依随前音节的调值走向而定,在同样的前音节调值之后就只能有一种表现。类似小姐、想法这种同轻声词明显不同的调型,显然不是轻声词,而是应该重新考虑它们的音系归属。最恰当的描述就是将它们看成重中词里的带调轻音节,其调型表现为半三声(试比较小姐和姐妹,想法和法院,任何北京人都会说其中两词里的“姐”和“法”应属同一调类)。这种重新定性只有在充分考虑词重音及重音对声调的影响的前提之下才可以得到。

则的忽视正是造成词汇重音扑朔迷离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三个是“社会语言变异”的原则,即要考虑到词重音可能还会因说话人性别、年龄和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如测试中发现,许多双音词,如道理、天气、砚台、解释、克服、帮助,在年长的和从事一般工作、特别是体力工作的北京人嘴里,可以表现得不但十分“左重”,甚至近于轻声,而在一些年轻大学生、特别是女大学生的嘴里,就常常没有重音。所以提出,对每个可能是左重的带调词,都需要在许多个不同社会类型的北京人中反反复复地调查核实之后才能判定为左重。而一旦被列为左重词,最好马上找一个相应的右重对比词进行声调的复审。我们觉得,只有按照这三条原则来取得的语料才会是可靠的。

3.2 被测词的位置

上一节里讨论了审词时的“交际”语境,即说话人会在什么场合、对谁说话时使用被测的词语,做法是将每个造好的口头语句在测试前将设计的语境详细解释给说话人,使其经过启发后自然地“说”出来。这一节里讨论词语本身的语境,即所谓的“上下文”,或为被测词在语句中的位置。我们的经验是最好将词语放在句子的焦点位置,且避免在句尾或短语尾的停顿之前。^[17]将控制这一位置的两种做法分别叫做“焦点突出法”和“的字衬托法”。

所谓焦点突出法,就是将被测词放在句子的语义焦点位置上,使整个双音组成为句子中的重读词语。一般来讲,在不进行并列对比的情况下,这很容易做到。只要是句中新的语义信息,就可以成为语义焦点而被重读,比如下面两个句子中的粗体词语:

- (5) a. 我见过那个人,他好像还挺**[文]明**。 (5) b. 我见过那个人,他好像还挺**闻[名]**。

由于整个双音组得到了句法和韵律结构上的突出地位,双音组中的重读音节就一定充分地得以实现而不会受到削弱。相反,如果被测试的双音组不是句子中最突出的词语,其中左重或右重音节之间的对比模式就不容易最充分、最鲜明地显现出来,如下面的两句:

- (6) a. 我看你是**[文]明**过分了。 (6) b. 我看你是**闻[名]**过分了。

这里所突出的语义重点不再是“[文]明”和“闻[名]”,而是“过分”,所以被测词不再像例(5)中的两句话那样突出,于是词语本身的左重和右重的格局就被削弱了,两个词语都可能呈现无显著重音的表层实现,即分不出左重和右重,所以被测词在例(5)中的位置显然比例(6)好。

可是除了语义焦点这个正面的位置需要充分利用以外,还有一个负面的位置需要考虑避免,这就是域尾。上面例(5)里被测词的位置虽然比例(6)好,可是未能逃脱这个域尾位置所受到的延长效应。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例(5) b的右重效果比例(5) a的左重效果要更明显,而例(5) a中的[文]明一词,则有可能会因其后音节的域尾延长,而使得词语本身的左重音稍为减弱。我们在解决这一干扰时所用的方法是将所有被测试的双音组后面都加一个“的”字,使其成为一个名词短语里传递新的语义信息的限制或修饰语,借此避开了停顿之前的位置。试看下面例(7)中的十六对句子:

- (7) a. (1 - 1)我点的都是**[新]鲜**的菜,你一定喜欢。/我点的都是**新[添]**的菜,你一定喜欢。
 (7) b. (1 - 2)他满口都是**[商]人**的话,真没法听。/他满口都是**伤[人]**的话,真没法听。
 (7) c. (1 - 3)这儿都是**[公]有**的财产,你不能拿。/这儿都是**工[友]**的财产,你不能拿。
 (7) d. (1 - 4)我们正在研究**[刊]物**的问题。/我们正在研究**勘[误]**的问题。
 (7) e. (2 - 1)那家小馆儿会让你尝到**[茴]香**的味道。/那家小馆儿会让你尝到**回[乡]**的味道。

[17] 这里的焦点(focus)系指句子的核心重音(Nuclear Stress),其严格定义,参冯胜利 2000。

- (7)f. (2 - 2) 可不是,那些[男]人的事儿有什么意思?
可不是,那些难[人]的事儿有什么意思?
- (7)g. (2 - 3) 这件事表明了公安部门[刑]法的威力。/ 这件事表明了公安部门行[法]的威力。
- (7)h. (2 - 4) 孩子想要的是那只[陶]器的动物。/ 孩子想要的是那只淘[气]的动物。
- (7)i. (3 - 1) 专案组讨论的是[损]失的问题。/ 专案组讨论的是死[尸]的问题。
- (7)j. (3 - 2) [法]人的权力? 我看你没有! / 打[人]的权力? 我看你没有!
- (7)k. (3 - 3) 这简直是[老]鼠的胆量,太让人吃惊了!
这简直是老[虎]的胆量,太让人吃惊了!
- (7)l. (3 - 4) 你是没看见过她[土]气的时候,所以你把她说得那么好。
你是没看见过她堵[气]的时候,所以你把她说得那么好。
- (7)m. (4 - 1) 他演的是一个[便]装的侦探。/ 他演的是一个变[装]的侦探。
- (7)n. (4 - 2) 他对那件事作了很[复]杂的考虑。他对那件事作了很负[责]的考虑。
- (7)o. (4 - 3) 那是一个[痛]苦的场面,你看了一定会难受。
那是一个动[武]的场面,你看了一定会难受。
- (7)p. (4 - 4) 争执不下时可以采取[避]讳的方式。/ 争执不下时可以采取闭[会]的方式。

经过这样的控制,不同重音类型之间的对比就可以尽量不掺杂其他的韵律效果,被测的双音组也就能充分地表现为应有的左重或右重了。

3.3 基本模式的建立和作用

在用声调对比法寻找左重同右重的差别时,我们还注意到,不能把对比仅仅限于个别词语上,而是要从个别到一般,要试图建立起一个模式来描写每个调型组合中的声调表现。首先将前面表1中十六对例词的声调表现用数字的调值尽量详细地描写出来,如表2所示。

	1		2		3		4	
1	55 - 3	5 - 55	55 - 3	5 - 35	55 - 1	5 - 214	55 - 3	5 - 51
	[初]期	初[七]	[工]程	攻[城]	[公]查	工[友]	[交]代	胶[带]
2	35 - 3	35 - 55	35 - 3	34 - 35	35 - 1	5 - 214	35 - 3	35 - 51
	[茴]香	回[乡]	[文]明	闻[名]	[林]产	临[产]	[谋]士	谋[事]
3	21 - 4	21 - 55	21 - 4	21 - 35	214 - 1	5 - 214	21 - 2	21 - 51
	[厂]家	想[家]	[敢]王	赶[鱼]	[手]法	守[法]	[启]事	起[誓]
4	51 - 3	53 - 55	51 - 3	53 - 35	55 - 1	53 - 214	51 - 3	5 - 51
	[道]家	到[家]	[便]捷	变[节]	[助]手	住[手]	[避]讳	闭[会]

表 2

在此基础上又发现,这种依据传统标调方法对声调的描述过于偏重细节,不易看出明显的格局,于是把传统所用的五度标调稍加概括,变成了只用1、3、5的三度标法,将1代表低调,3代表中,5代表高,并在重读长音节的数字调值上方借用了平时表示一声、二声、三声、四声的调号来分别表示平调、高升、低升和降调。这样表2就简化成了表3(见下页)。为突出左重词语的模式,将每纵列里的左重组加粗。

经过这样的简化,我们对北京话四个声调在左右重双音组的每个音节里的表现得到了以下四条总括的描写,这也就是我们在观察基础上得到的模式。

	1		2		3		4	
1	$\bar{5}3$	$5\bar{5}$	$\bar{5}3$	$5\dot{5}$	$\bar{5}1$	$53\check{}$	$\bar{5}3$	$5\dot{5}$
	[初]期	初[七]	[工]程	攻[城]	[公]有	工[友]	[交]代	胶[带]
2	$\check{5}3$	$5\bar{5}$	$\check{5}3$	$5\dot{5}$	$\check{5}1$	$53\check{}$	$\check{5}3$	$5\dot{5}$
	[荷]香	回[乡]	[文]明	闻[名]	[林]产	临[产]	[谋]士	谋[事]
3	$\check{1}3$	$1\bar{5}$	$\check{1}3$	$1\dot{5}$	$\check{3}1$	$53\check{}$	$\check{1}3$	$1\dot{5}$
	[厂]家	想[家]	[敢]王	赶[鱼]	[手]法	守[法]	[启]事	起[誓]
4	$\check{5}3$	$5\bar{5}$	$\check{5}3$	$5\dot{5}$	$\check{5}1$	$53\check{}$	$\check{5}3$	$5\dot{5}$
	[道]家	到[家]	[便]捷	变[节]	[助]手	住[手]	[避]讳	闭[会]

表 3

(8) a. **左重组轻音节(位置在后)**:所有高调,包括一声高平调、二声高升调和四声高降调,一律下降成中短调[3],而本来是低升调的三声则下降为低短调[1]。二、三、四声这三个曲折调不再有任何曲折变化。

(8) b. **左重组重音节(位置在前)**:一律实现为充分的本调,调值及升降均无改变。^[18]

(8) c. **右重组轻音节(位置在前)**:所有高调都保持原有的高调值,包括三三连读变调变出的二声,但由于轻读、变短,而一律中和成无升无降的直调。

(8) d. **右重组重音节(位置在后)**:一律实现为充分的本调,调值及升降无任何改变。

注意上面四条中仅有(8) a 用了粗体字。这是因为左重组的轻音节是我们考察的重点。(8)中模式的建立,特别是(8) a 里所有调值的下降,同其他三个位置的音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就突出了我们考察的结果,即左重双音组后音节因轻读而声调降低,而这种声调的降低又反过来证明了带调左重这一重音类型的存在,也同时说明了声调在体现重音时的重要意义。

在运用这个模式来进一步审核更多的双音词语时,我们一方面觉得更有信心和根据,一方面觉得仍是需要使用已经经过多个北京人用语感所证实了的例词,仍是要将被测的新词同已经确定的“典范词”反反复复地进行比较,从比较中求得鉴别。在十六个调型之下分别积累了一批较多人判断一致的左重的“典范词”(每个调型都已有上百个至几百个),又通过使用这些典范来继续增加每组里的新成员。在请北京人为我们鉴别时,首先介绍这个语料库里已有的“典范词”,一方面请他们再确认,一方面用以启发他们的语感,并训练他们将语料模拟使用和从中比较鉴别的能力。在与他们一起比较的过程中,我们尤其发展出了一个所谓“调换歪曲法”的有效方法。“调换歪曲法”依靠的是最小差别对或近似最小差别对。做法是先找一个初步认定为左重的双音组,再找一个明显为右重的词与之对比,两对音节的发音尽量一样或相近,尤其是韵母,好完全一样。然后将二者的重音类型调换,左重的说成右重,右重的说成左重,看这样“歪曲”以后说着和听着是否还舒服,是否“对劲儿”。如果得到的感觉是“这样也还行”,则说明重音的对比不能成立。反之则证明确有左重和右重之分。比如要测[痛苦]这个词是否是左重,就找了右重的动[武]作为对比词语,然后造两句话,把这两个词放在一样的位置上,如例(9):

(9) a. 那个[痛苦]的场面太让人难受了。 (9) b. 那个动[武]的场面太让人难受了。

[18] 注意这里的三声在一声、二声和四声前(即在[厂]家、[敢]王和[启]事的声调中)被标为一个更低的低升调 $\check{1}3$,这是因为三声本来在任何高调之前都实现为只降不升的“半三声”,其升尾被后面的高调所吸收,此处也不例外。但既然后面的轻音节调值下降为[3],前面重读的半三也就表现得更低。但三声在另外一个三声前(即在[手]法的声调中),则同其他声调一样实现为并不变调的本调。

当发现孤立地说这两句话对比不够明显的时候,就用动[武]的声调([53^ˇ])来说[痛苦],再用[痛苦]苦的声调([51])来说动[武],这样就明显地感觉到“不对”了。尤其是当把右重的词语用左重的语调来说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能立刻反映出“不对”和“不行”的感觉,告诉我们“没人那么说话。”又比如例(10)里的两句,也是我们用过的“调换歪曲法”的实例。

(10) a. 你得选一个[政]治一点儿的题目。 (10) b. 你得选一个正[式]一点儿的题目。

歪曲的结果都被帮我们鉴定的北京人给否定了。

总结起来,我们觉得通过这种声调对比的方法来检测和验证模式,又反过来用模式审核、确定更多的左重词,是一种比较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也比较适合我们所研究的对象——北京话的词重音。我们对词重音的总体认识是:相对于声调来讲,它可以被看成一种较为次要的音系特征(因为不会引起词义的对立),而且仅仅是北京人口语里的特征,但它确实存在于北京人内在的语言系统里,反映到他们的有声语言及他们的听觉判断之中,因而不能忽视,应该成为北京音系研究的一部分。然而它又不是一种可以由音系规则直接预知的、简单的现象,因而只能采取一种由下至上、由观察语料出发进而总结上升到模式的方法来研究。本节中谈到的当然只是研究的一个方面,只限于如何确定什么是重音的实际表现,还没有涉及这些左重右重的模式从历时的角度看是怎么形成的,从语法、语义、语用和音系的层面上如何解释,等等。但仅就表现这一点而言,我们认为以上的研究成果及从中得到的方法都是足以值得介绍、值得引起注意的。下边简述一下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北京话词重音的整体构想。

4 关于北京话词重音的构想

4.1 再论左重是实际存在的重音类型

从上述结果和(8)里运用声调对比法建立起的模式,可以更明确地肯定带调左重类型的存在。同2.2里所引的毛世桢(1999:115)的结论相反,我们审定出为数相当不少的一类双音组,它们绝不是“有时发成前重,有时发成后重”,而是被北京人肯定为“不会说成后重”。如果用歪曲法故意说成后重,他们就会“感觉不舒服”。可这类词又不是轻声词。在比较的时候,大家都说可以感觉到[政]治、[富]裕这些带调的左重词同[正]的、[负]的这些失了调的轻声词不同。更可显现这种区别的是比较左重的[正]数、[负]数同轻声的[正]的、[负]的,北京人感觉到的区别足可将“左重”建立一个单独重音类型。

如不将语料局限在合成词的范围内,应该说带调左重的例子比比皆是。徐世荣(1982)曾以妻子同旗子的对比来强调左重类别的存在,如此可以引伸到一些古代人名,如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孙子、荀子等,其中的子都不是轻声,却又不能读成像鱼子和电子里的子那样重。又如汉语所用的日本女孩的名字,春子、阳子、久子、幸子。我们也用了类似的例子,比如双音节的称谓词。如果姓氏后面跟的是亲属性的称谓,一般都会说成左重。如果是纯亲属的叠音称谓,就会是轻声。而如果是一个双音节的人名,就一定是右

	1	2	3	4
1	[张]叔	[张]娘	[张]姐	[张]氏
2	[王]叔	[王]娘	[王]姐	[王]氏
3	[李]叔	[李]娘	[李]姐	[李]氏
4	[赵]叔	[赵]娘	[赵]姐	[赵]氏

表4 左重(姓氏加称谓)

	5	5	5	5
1	[姑].姑	[丫].头	[包].子	[说].过
2	[姨].姨	[石].头	[桔].子	[提].过
3	[奶].奶	[镐].头	[饺].子	[买].过
4	[妹].妹	[木].头	[粽].子	[卖].过

表5 轻声(叠音亲属词及后缀词语)

	1	2	3	4
1	张[中]	张[强]	张[雪]	张[志]
2	王[中]	王[强]	王[雪]	王[志]
3	李[中]	李[强]	李[雪]	李[志]
4	赵[中]	赵[强]	赵[雪]	赵[志]

表6 右重(双音节姓名)

重,这三类之间不可以调换和歪曲。表4、表5、表6可以说明这些,但由于叠音称谓词两个音节的本调一样,只能得出16种调型中的四个,所以在表5的后三个纵列里补进了由单字调为二声、三声和四声的轻声词缀构成的轻声词语。各表的结构和以前一样,左列代表前音节的声调,上方横排代表后音节的声调,方括号代表重音。表5里新加进了后音节前的圆点,用以表示轻声。轻声音节一律标为第5声,但补进的后三列按失去声调之前的原调排列,以便同表4里相同位置的左重组进行比较。

上述三种轻重类型的分界更加证明了我们关于“左重类型确实存在”的研究结果。除此之外,还发现,大家日常惯用的专名词,如双音节地名和外来音译的人名地名,也有左重右重之不同,只不过人们习以为常,未加特别注意而已。下面是我们找到的几组例子,供北京人放到口语中去进一步证实。

	1	2	3	4
1	[天]津	[烟]台	[青]海	[遵]化
2	[邯]郸	[辽]宁	[河]北	[长]治
3	[陕]西	[满]城	[海]口	[保]定
4	[四]川	[大]连	[上]海	[肇]庆

表7 左重中国地名

	1	2	3	4
1	西[沙]	思[茅]	东[莞]	深[圳]
2	延[安]	台[南]	台[北]	宁[夏]
3	北[京]	沈[阳]	普[洱]	百[色]
4	汉[中]		旺[角]	大[庆]

表8 右重中国地名

	1	2	3	4
1	[科]拉	[埃]及	[伊]朗	
2		[荷]兰	[罗]马	[莱]克
3			[蒙]古	
4		[越]南	[曼]谷	[智]利

表9 左重译名

	1	2	3	4
1	多[哥]	车[臣]	刚[果]	希[腊]
2	伦[敦]	罗[德]	查[理]	福[特]
3	纽[约]	保[罗]	比[尔]	卡[特]
4	不[丹]	贝[宁]	克[理]	大[卫]

表10 右重译名

我们觉得,有了上面这些经过北京人验证的例子,有了如此明显的重音对立和如此实在的语感,如果仍不承认“左重类型”的存在,那就只能“视而不见”,要么就得“避而不谈”了。

从上述语料中,还可以看出一个强烈的倾向性,亦即:中国地名左重居多,右重为少;而外来译名则右重居多,左重无几。此外,在每组语料中,某些声调搭配的例词较多、较容易找到,而另一些较少、甚至很难找到。诸如此类都是我们一直研究的现象,但由于它们更多地关系到重音形成的相关因素,当需另文专述,故此不赘。不过,希望通过这些语料给大家一种启示,即双音节词语的左重右重问题显然不像2.3里所引的林华和端木三的论断那样简单,而是带有相当程度的任意性,或者叫做词汇性。(参Feng 1995, 2002)这一点在下文还会继续探讨,这里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证明左重词语的存在。

4.2 关于“右重”和“中重”

前面说过我们的研究基本上是遵循了上文所引的殷作炎和徐世荣那种审词定类的方针,并且是为了寻求更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带调双音组有左重,亦即殷等所提出的“重中”的类型。那么上述的初步成果是否仅仅证明了这一类型的存在,仅仅否定了林茂灿等的“一律右重”和端木三的“一律左重”,或者仅仅支持了将北京话双音组分为“中重”、“重中”和“重轻”这三类的看法呢?换句话说,在我们明确了左重词语里包含有带调和无调这两类的同时,是否认为其余的都是中重了呢?在上文我们曾提到徐世荣强调重中里的“中”应该更准确地描写为“次轻”,因为它轻于中重里的“中”。我们自己在表3和(8)的模式里也总结到这两种“中”的不对称现象:左重后音节里“中”表现为声调全面下降,而右重前音节里的“中”充其量只是音节稍稍变短,曲折调稍稍变直。这些要不要反映到分类上呢?我们探讨的途径是从“中重”这一头入手,如表11所示,而保留将左重分为带调的重中和失调的重轻两类,尽管它们之间的差别

仅在于声调的变化,也尽管徐世荣所提的“次轻”的建议很有道理。

带调			无调
???	中重	???	重中
右重		左重	

表 11

其实,我们早在研究的初期就已经在探讨:是不是右重的双音词语都是中重,还是也有的前音节没有变到“中”的程度?我们在审词时发现:大部分动宾结构的双音组,不论是已经固化为合成词的(如吃[亏])还是松散的动宾短语(如洗[手]),除了转化为名词的以外(如[参]谋、[屏]风),大都是典型的右重,(王志洁,冯胜利 1998a)这与许多学者历来的看法(如赵元任 1968)一致。由于明显的右重,前音节的确显示了变短和变直的特点。但是同时也发现了很多不那么明显、也不那么典型的右重或中重,像很多偏正及其他结构的合成词或短语,如公安、延长、地震、民主、马列,甚至带所谓前缀的第一、第二等,都可能没有动宾结构那样前轻后重。所以在第一轮正式审词标类时所设定的类别包括了左重、右重和一个“不分”类。我们在二人判断一致的大约一千个常用双音词语中得到了三种类型各占三分之一的结果。在报告这个初步结果时,(王志洁,冯胜利 1998b;王志洁 1999b,2000)我们曾举出了一部分例词来说明这三类区分:

(11) 1-4 调类中的左重、右重和“不分”举例(王志洁 2000):

左重:安静、帮助、包庇、猜测、仓促、方便、穿戴、刁难、吩咐、收获、声誉、干涉、估计、规律、恢复、督促、修炼、庄重、伤害、辜负、遭遇、装饰、家务、经验、科目、宽慰、方式、舒畅、温度、发育、亲切、敦厚、压力、忧郁、偏僻、……

右重:包办、编队、编号、标价、参战、车库、充电、出众、担架、灯泡、登陆、抽空、发电、光棍、出错、发货、刀刃、开业、拉客、拍卖、拼命、签字、失控、输液、听话、偷税、销假、歇业、心细、宣战、支票、山洞、交帐、生病、失业、……

不分:安葬、搬运、鞭炮、出售、车速、当代、崩溃、方案、分店、干旱、更正、宫殿、关闭、规定、欢度、激战、交替、接近、经费、捐献、军备、科技、空运、趋散、升降、收购、书信、酸菜、通货、先进、相互、宣告、招聘、诸位、香料、……

并且设想“不分”类型的词语可能比右重的还要多,如图 1 所示:[19]



图 1 北京话双音组各重音类型之间的关系(王志洁 2000)

这个图形也反映了早先我们有关现代汉语词化重音逐步左移的“现行变化”(an on-going change of Mandarin gradational destressing from right to left)的理论假设。(Feng 1995,2002)

然而,将各类词语开始又一番审核对比,就发现:其实在右重和不分这两类之间,北京人对很多词语的判断是十分不稳定的,即便是例(11)中所引的例词和未经引出的其他十五种调型的例词,每次的复审和对每个人的咨询结果也会有很大的变动。比如上面例(11)里列为右重的车[库]和列为不分类的[车][速],其实并无区别,而如果将它们按照左重的[科]目的声调说成[车]库和[车]速,就会被多数人否定。

[19] 图 1 的字母 X、Y、Z 表示介乎两个相近类型之间的“灰色地带”,即有些词语既可以属于左边的类型,又可以属于右边的类型。

我们进而又将图 1 中设想的四类重音依照从右音节最轻到右音节最重的系列排在表 12 里对比,就看出:大类的区分其实还是在左重与右重之间,右重同不分的立类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必要。

调	重轻/轻声	重中/带调左重	重重/不分	中重/右重
11	冤.家	官家	专家	搬家
12	丫.头	关头	葱头	梳头
13	桩.子	庄子	親子	杀子
14	腥.气	风气	空气	争气
21	娘.家	杂家	国家	成家
22	拳.头	源头	矛头	抬头
23	裙.子	荀子	莲子	寻子
24	俗.气	习气	毒气	服气
31	马.家	法家	老家	养家
32	镐.头	把头	乳头	点头
33	嫂.子	老子	犬子	产子
34	小.气	语气	暖气	喘气
41	赵.家	道家	大家	顾家
42	兆.头	教头	镜头	碰头
43	凳.子	孟子	半子	教子
44	秀.气	锐气	废气	泄气

表 12

这样再次比较的结果还使我们认识到,以往分类之所以总是首先在有调与无调之间划一条大界,乃是受了多年来所持传统观点的影响,认为轻声是毫无争议的大类,其他一切争论都只是在轻声以外的范围里去探讨,我们的研究也未能突破这个传统。八年时间里对上万条语料反反复复的比较审核,从语料到模式,又从模式到语料,使我们终于跳出了这个传统的框架,看到表 12 中的四个重音类型其实应该是将左右各两列归在一起,即将带调与无调的左重看作一个大类,而将无论是较为明显的(如动宾结构那样的)右重,还是不大明显的(如左右同重的)右重,都归在一起成类。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之间的内部区别,其实大不过北京人对左重与右重的基本判断。不过对于右重的一类,我们采取了特别慎重的态度。除了对像车库和车速那样的词又经过反复核实以外,还对所有以前被列为右重和不分的两大类,都作了重新的审核。我们特别建立了像表 13 这种典型右重的动宾词语的模式,以此作为参照调查其他、特别是以前被划作“不分”的条目,如表 14。调查的结果倾向于“差不多。”

	1	2	3	4
1	吃[亏]	吃[糖]	吃[请]	吃[素]
2	骑[车]	骑[驴]	骑[马]	骑[象]
3	打[工]	打[人]	打[水]	打[字]
4	种[花]	种[田]	种[草]	种[树]

表 13 右重(动宾结构)

	1	2	3	4
1	[中][央]	[中][途]	[中][转]	[中][断]
2	[民][生]	[民][权]	[民][主]	[民][意]
3	[海][关]	[海][员]	[海][港]	[海][战]
4	[地][沟]	[地][皮]	[地][铁]	[地][窖]

表 14 同重/不分

这样我们就对前面表 11 中的问题有了一个初步的答复,以此作为我们对北京话双音组重音类型讨论的一个总结。我们提出不必再使用“中”的等级,甚至也不必再去追究左重以外的那一大部分双音组到底是更多地表现为左边有一点轻的右重(即原来所说的中重)还是左右差不多的右重。总而言之,它们不是左重。我们觉得在词汇的平面上可以把重音的类型总结成(12)中的三句话,并把表 11 里的分类示意图重新修改为表 15。

- (12) a. 北京话的双音组分左重与右重两大类。 b. 左重的一定右轻,但右重的一定左轻。
c. 左重是北京话唯一的词重音形式,涵盖带调与轻声两类。

左重	右重	
无重音词	带调左重词	轻声词
带调	无调	

表 15

这也就是说,左重词语的右音节可以是带调的,也可以是更轻的,甚至轻到失去了原有的声调,二者之间常常并无严格界线。但无论是哪一种,它们的左重属于词汇重音,是要经过对北京人的调查、由语言学家和字典编纂者确定下来,标在字典里的。左重类的重音是北京话里唯一的词重音;不是左重的双音词就没有词重音,其左右音节可以看作轻重不分或差不多。^[20]至于作为右重典型代表的动宾结构,我们认为它们的重音不是词汇性的,不是任意的,不需要像左重那样一个一个地确定,也不需要字典上标出。所有未能获得左重音的双音组之所以如此,一定有某种原因:或是句法的,或是语义的,或出自书面语体,或出自声调搭配等等。然而,我们的看法是,只要它们共同存在于那个没有词汇重音、不成为左重的大类里,它们的重音必然会在进入语流的时候,通过节奏重音的音系规律或因受到其他句法语义的支配而表现出来。现在的表 15 比以前明确了很多,也简单了很多。我们不必再在“重”和“中”的等级上比来比去,而是只用左右、只用“有重音”和“无重音”就可以解决分类的问题了。

5 结论

在本文里,我们较为详细地回顾了以往的重音研究,提出了扼要的评论;与此同时,也提供了自己过去近十年来的研究所得,并提出了一些与传统不同的新的方法和结论。所有这些,可统言为如下数端:

- i) 北京人对词汇重音有着真实的语感,研究重音必须以这种语感为目标;
- ii) 词汇重音主要表现在口语语体之中。北京人文读,字字着力、抑扬不大;一旦说白,则轻重自显,泾渭分明。因而研究时必须区分文白,且以白话语料为据;
- iii) 词汇重音不仅表现在音节的长短,还同时表现为声调的变化,因而可将声调表现作为检验重音的重要依据之一;
- iv) 检测方法必须恰当。我们首先设计出以“最小差别对”为手段的“声调对比法”,其次发展出“焦点突出”、“的字衬托”、“调换歪曲”等不同方法,交替测探,终于使北京人口语里的重音类型从扑朔迷离的现象中显现出来;
- v) 左重类型,存在无疑。这既是以往重音研究的难点,也是本文论证的焦点。本文以大量语料为证,将此长期疑惑、争议不休的重音类型肯定下来,并提出带调左重组同无调轻声词同时体现北京话最小单位的词汇重音;
- vi) 本文随之提出了将北京话双音组的重音“一分为二”的新建议,将以往强调的“有调无调之分”和划分“重、中、轻”三等级之传统均视为实证欠妥的表面描写,而重新建立起“左重为词汇重音,非左重形

[20] 关于“没有词重音”的这一大类,因牵涉到短语重音及汉语复合词的组合来源等一系列更为有趣也更为复杂的理论问题,此处不便详论。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得到的研究成果同 Feng (1995)、冯胜利(1997,2000等)关于汉语韵律词的多篇论述恰相呼应。简言之,由于汉语的复合词是最小句法单位“压合”的产物(参 Huang 1992,“不遵构词句法的移位运作”),压合的对象是短语,压合的动力源于韵律,而压合的“尺寸”和结果为韵律词,这就造成了汉语“短语成词、词含短语”的特殊属性,一待反映到音系上,就造成“不词不语”且“左右音节轻重不分”的结果。

式由词汇以外因素决定'的观点。

以上六条从研究目标、语料、重音表现、检测方法、结果、建议及从宏观角度看到的研究方向等六个方面总结了全文各节中的要点,既是本文的核心,也是我们多年的心得。其中涉及的问题还有很多,限于篇幅,只得割爱。以讨论的深度而言,有些分析我们也只能点到为止,详征博论则有待来日。至于是耶非耶,尚祈方家是正。

参考文献

- 巴维尔 1987 北京话正常话语里的轻声(许毅译自英文原稿),《中国语文》第5期,330-345页。
- 端木三 2000 汉语的节奏,《当代语言学》第4期,203-209页。
- 冯胜利 1997 《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冯胜利 1998 论汉语的自然音步,《中国语文》第1期,40-47页。
- 冯胜利 2000 《汉语韵律句法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冯胜利 2004 动宾倒置与韵律构词法,《语言科学》第3期,12-20页。
- 高名凯 石安石 1963 《语言学概论》,北京:中华书局。
- 厉为民 1981 试论轻声和重音,《中国语文》第7期,35-40页。
- 林茂灿 颜景助 孙国华 1984 北京话两字组正常重音的初步实验研究,《方言》第1期,57-73页。
- 林茂灿 1989 轻重音,载吴宗济、林茂灿主编,《实验语音学概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吕叔湘 1963 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中国语文》第1期,11-23页。
- 毛世桢 1999 普通话二字词的轻重格式,载吕士楠等主编《现代语音学论文集》,113-116页,北京:金城出版社。
- 徐世荣 1980 《普通话语音常识》,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徐世荣 1982 双音节词的音量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4-19页。
- 殷作炎 1982 关于普通话双音常用词轻重音的初步考察,《中国语文》第3期,168-173页。
- 王洪君 2001 音节单双、音域展敛(重音)与语法结构类型和成分次序,《当代语言学》第4期,241-252页。
- 王洪君 2004 论汉语的节奏类型——松紧型,《语言科学》第3期,21-28页。
- 王晶 王理嘉 1993 普通话多音节词音节时长分布模式,《中国语文》第2期,112-116页。
- 王志洁 1996 从轻声和变调看音系分析的范畴与层次,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音研究室编《第三届全国语音学研讨会论文集》,66-67页。
- 王志洁 1999a 词汇变调、词法变调和音系变调,载徐烈炯主编,《共性与个性——汉语语言学中的争议》,288-310页,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王志洁 1999b 北京话双音节左重词语的音系归属,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语言学研讨会学术论文。香港。
- 王志洁 2000 北京话“重中”词语的音系研究,第十二届北美汉语语言学年会学术论文,圣地亚哥。
- 王志洁 冯胜利 1998a 双音节词语的内部结构和词重音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学国际会议学术论文,北京大学。
- 王志洁 冯胜利 1998b 北京话双音节词语重音初探,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语言学研讨会论文,香港。
- Abramson, A. L. 1979 Lexical tone and sentence prosody in Thai. *Proceeding of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Phonetic Sciences*, Vol. I, Copenhagen, 380-387.
- Bao, Zhiming. 1999 *The Structure of Tone*.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en, Chung-Yu. 1984. Neutral tone in Mandarin: phonotactic description and the issue of the norm.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2.2:299-333.

- Chen, Matthew Y. 1996 *Tone Sandhi*. MS. UCSD.
- Chen, Matthew Y. 2001 *Tone Sandhi: Patterns across Chinese Dialects*. Oxfor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eng, Chir-Chuan. 1973 *A Synchronic Phonology of Mandarin Chinese*. Mouton. The Hague.
- Dow, Francis D. M. 1971/1972 *The Analysis of Trochaic Words in Chinese*. Edinburgh:University of Edinburgh.
- Duanmu, San. 1990 *A Formal Study of Syllable, Tone, Stress and Domain in Chinese Languages*. Ph.D. Dissertation, MIT.
- Duanmu, San. 2000 *The Phonology of Standard Chinese*. New York,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uanmu, San. 2001 Stress in Chinese. In Xu, Debao, ed., *Chinese Phonology in Generative Grammar*, 117 - 138. Academic Press.
- Feng, Shengli. 1995 *Prosodic Structure and Prosodically Constrained Syntax in Chines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Feng, Shengli. 2002 *The Prosodic Syntax of Chinese*. Lincom Europa. Lincom Studies in Asian Linguistics.
- Hoa, Monique. 1983 *L'accentuation en Pekinois*. Paris:Editions Langues Crois 6.
- Huang, C.-T. James. 1992 Complex Predicate in Control. In R. K. Larson, S. Iatridou, U. Lahiri and J. Higginbotham eds. *Control and Grammar*, 109 - 147.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Jiang, Ping. 1996 *An Optimality Account of Tone-Vowel Interaction in Northern Mi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 Kratochvil, Paul. 1964 *Disyllabic stress patterns in Peking dialect*. *Archiv Orientální*, 32:383 - 402.
- Kratochvil, Paul. 1969 *Syllabic volume as acoustic correlate of perceptual prominence in Peking dialect*. Unicorn (Princeton Chinese Linguistics Project), 5:1 - 28.
- Kratochvil, Paul. 1974 Stress shift mechanism and its role in Peking dialect. *Modern Asian Studies* 8.4:433 - 458.
- Lin, Hua. 1994 Mandarin Stress Revisited. In Camacho, Jose & Lina Choueiri, eds., *Proceeding of the 6th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Vol. II, 102 - 111.
- Lin, Hua. 2001 Stres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Neutral Tone in Mandarin. In Xu, Debao, ed., *Chinese Phonology in Generative Grammar*. Academic Press, 139 - 161.
- Meredith, Scott. 1990 *Issues in the Phonology of Prominence*. Ph.D. Dissertation, MIT.
- Shih, Chilin. 1986 *The Prosodic Domain of Tone Sandhi in Chines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 Shih, Chilin. 1997 Mandarin third tone sandhi and prosodic structure. In Wang, Jialing & Novel Smith, eds., *Studies in Chinese Phonology*, 81 - 123. Berlin:Mouton de Gruyter.
- Wang, Jenny Z. 1996 The Syntax-phonology mismatch: prosodic word and foot formation in Mandarin, Polylinguists Seminar on Linguistic Interfaces, Polytechnic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Wang, Jenny Z. 1998 Beijing syllabic tones and stressability hierarchy. Annual Research Forum, Linguistic Socie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 Wang, Jenny Z. 2000 Neutral tone as a lexical phenomenon. Annual Research Forum, Linguistic Socie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 Yip, Moira. 1982 Word and phrase stress in Mandarin. 《第十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论文摘要汇编》,北京。
- Yip, Moira. 1990 *The Tonal Phonology of Chinese*. New York, London:Garland Publishing, Inc.

作者简介

王志洁,女,天津市人。南开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本科生,广州外国语学院应用语言学文凭班进修生。美国匹兹堡

大学语言学硕士,特拉华大学语言学博士。曾任教于南开大学外文系,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现任教于美国海军学院外语系。研究方向为汉语语言学和语言教学。

冯胜利,笔名冯利,男,1955年5月15日生于北京。197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79年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汉语专业研究生,从陆宗达先生治《说文》,1982年毕业留校。1986年赴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语言学系读书,1995年获博士学位。1994-2003年在堪萨斯大学东亚系执教,任副教授。2003年至今在哈佛大学东亚系执教,任教授及中文部主任,同时兼任北京语言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研究兴趣在韵律构词学及韵律句法学的建立以及历史句法学和对外汉语教学。出版专著有《汉语韵律句法学》等,并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语文》和 *Linguistics, East Asian Linguistics* 等杂志发表论文数十篇。

Tonal Contrast and Disyllabic Stress Patterns in Beijing Mandarin

Wang Zhijie¹ Feng Shengli^{2,3}

¹ *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 Annapolis Maryland USA*

² *Department of EALC, Harvard University, Boston Massachusetts USA*

³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findings of the two authors' collaborative research since 1996 on disyllabic stress patterns in Beijing Mandarin. It addresses 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issues in Mandarin phonology as to whether a full-tone disyllabic can appear (in native speech) as a tonal trochee, hence whether Beijing Mandarin has lexical stress on full-tone disyllabics. The study departs from previous positions by introducing a research method relying on tonal contrasts for important evidence of stress. 16 pairs of contrastive patterns of full-tone disyllabics have been established as a model, based on several hundreds of minimal or near minimal pairs tested repeatedly among native speaker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onal trochees do exist in Beijing Mandarin, especially in colloquial speech, and that these tonal trochees should join the non-tonal trochees to form the language's lexically stressed category.

Key words stress tone neutral-tone words tonal disyllabic tonal trochee minimal pair

中国语言学会第 13 届学术年会征集与会论文提要

由中国语言学会主办、河北师范大学承办的“中国语言学会第 13 届学术年会”定于 2006 年 8 月中旬在河北省秦皇岛召开。本届年会将就汉语及民族语研究的诸多问题进行学术交流。凡有意与会的会员,请在 2006 年 3 月 31 日(以邮戳为准)以前,将论文提要(800 字以内为宜)提交给学会秘书处。电子邮件与传真恕不接受。论文提要经常务理事会审定通过后,通过者将于 5 月份收到与会通知。

联系人:中国语言学会秘书处 丁欣兰 地 址:北京市建内大街 5 号语言研究所中国语言学会秘书处 100732
电 话:(010)85195373 传 真:(010)65125849

(中国语言学会秘书处)